

与中国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研究 ——以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的相关报道为例

李博晔¹ 黄芊^{2*}

(¹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650500, ² 云南大学, 云南 650500)

摘要: 在全球权力转移与数字地缘政治交织的背景下, 非西方世界如何解码中国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 成为突破“中心—边缘”认知范式的重要切口。本研究以2023年沙伊和解事件为棱镜, 考察南亚—东南亚7个陆地接壤国家(印度、尼泊尔、越南、缅甸、老挝、不丹、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中国中东调解角色的认知建构机制。探讨该区域在涉华报道中如何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本文从报道规模、情感倾向、叙事框架、语言策略等维度展开分析, 总结出该区域媒体主要构建了“和平调解者”“战略扩张者”与“现实主义行动者”三类中国形象。但由于部分国家相关报道的缺失, 无法全面代表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 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得以继续深入研究。

关键词: 国家形象; 沙伊复交; 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项目专项资助经费 (20231068103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1

一、研究概述

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持续提升, 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日益成为国际传播与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近年来, 中国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外交行为频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2023年3月, 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 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在北京举行秘密会谈。3月10日, 三方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沙伊关系将全面恢复。在中国斡旋下,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达成协议, 同意恢复自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1]沙伊矛盾曾是中东地区影响最广泛的矛盾之一, 两国在北京宣布复交, 有望带来积极、正面的连锁效应, 为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多个地区热点问题降温。^[2]该事件被广泛视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实现外交突破的标志性成果, 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安全倡议、展现“大国调解者”形象的重要体现。

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实现复交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成果, 展现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与中国地缘接壤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地理、安全和经济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其主流媒体对中国斡旋中东事务的报道反映出各自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判断的同时也反映出它们在区域格局中的中间与态度。这些国家并未直接参与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的事件进程, 但其主流媒体的报道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主流媒体报道内容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对中国国际行为的关注程度、价值判断以及战略态度。通过分析这些媒体是否报道、报道的数量和倾向, 可以观察这些国家如何认知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作用、是否认可其国际调解者的身份, 进而折射出中国国家形象在周边区域的外部感知状况。

二、研究论述

国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较早, 美国学者马丁等认为, 国家形象是个体对某一国家的综合感知和评价。^[3]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的信念的总和。其中描述性信念反映了个体对国家客观特征的认识。信息性信念主要来源于如广告、媒体、口碑等渠道的外部信息传播, 这些信息构成了个体对国家的具体知识。

作者简介: 李博晔(2003—), 男,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在读学士, 研究方向: 舆情研究, 智能传播;

黄芊(2002—), 男,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计算传播, 智能传播。

通信作者: 黄芊

^[4]巴洛古认为国家形象是通过感知、情感及整体评价共同作用形成的对某一国家的总体认知结构,其由个体对国家各类特征的认知和由这些认知所引发的情感反应共同构成。^[5]个体通过对这些特征的评估形成对国家的整体印象。国家形象的认知结构依赖于外部信息输入的有效性性与情绪唤起的强度。在现代媒体高度可视化、情绪化、框架化的信息生产体系中,国家形象不仅是媒体呈现的客体,更是被反复重构的传播产物。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取决于国家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与表现,更取决于国际媒体系统如何设置议题、选择框架并分配叙事权力。尤其是在重大外交事件中,媒体话语策略对国家形象的引导效应不容忽视。

徐小鸽是我国最早开始研究国家形象的学者,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新闻媒介通过报道某个国家的事件、人物和社会状况,塑造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6]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与研究内容,本文将国家形象界定为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与感知印象。本文以中国相邻国家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为样本,从框架类型、情感倾向和立场标注等视角探究其话语特征及中国形象的建构模式。

三、样本选择及类目构建

在本研究计划分析与中国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事件的报道。具体来说,本研究期望涵盖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老挝、不丹、越南等邻国主流媒体,并于每个国家中选择三个主流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沙伊复交并非持续性事件,但在之后如伊朗重新开放了其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吉达的总领事馆和代表处,2023年8月17日,在沙伊断交七年后,伊朗外长首次对阿拉伯进行访问这类事件再次对沙伊复交进行报道。由此在检索报道时以“Saudi Iran”为关键词,时间设定在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

在印度以上述关键词和时间进行检索,报道来源复杂多样,在对报道来源进行筛选之后选择《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三家媒体作为研究样本来源。在尼泊尔用同样方式检索筛选后选择《喜马拉雅时报》、《加德满都邮报》、《坎蒂普尔报》作为尼泊尔报道来源。在巴基斯坦用同样方式检索筛选选择《巴基斯坦通讯社》、《国民报》、《黎明报》。在越南用同样方式检索筛选后有且仅有《人民报》对相关事件进行报道,由此选择《人民报》作为越南报道来源。在对于样本的选择方面,笔者排除了不丹、缅甸、老挝,其最主要原因在于资料获取可行性极低通过在Factiva新闻数据库及在官方网站中对相关媒体的检索与筛选,发现以下三个国家的媒体并未对该事件进行报道:不丹、缅甸、老挝。同时不丹、老挝与缅甸在中东地区的外交、能源或地缘合作联系较为有限,中国调解沙伊复交对其国家战略、安全局势或区域角色影响较小,因而相关报道中更少体现出国家立场或情感表达,不具备充分观察“国家形象情感倾向”的研究价值。

以沙特伊朗和解、恢复外交作为相关标准,对十家媒体所有“Saudi Iran”报道进行阅读并筛选删减后,共获得相关报道71篇。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四方对事件报道的基本概况,本文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共设定报道数量、报道主题、新闻体裁、报道倾向、四个类目,对报道样本进行编码,具体如下:报道数量:按照报道时间,对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共计六个月内,中国、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报道数量进行统计并分析其变化趋势。报道主题:本文根据数据库与原网站对新闻稿件的主题划分,共将沙伊复交的报道题分为军事行动、政治、国家公共安全、外交关系与事务、国际关系新闻体裁:根据样本实际情况,将新闻报道体裁分为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文章四种。报道倾向:基于报道中的情感词将报道的整体情感倾向分为正面、中性、负面。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两种研究路径。通过内容分析法从报道数量、主题、体裁、倾向性四个维度对报道样本进行概括性呈现。内容分析方法能够有效提取特定时期内的信息传播重点,揭示信息在特定阶段的表达趋向、态度立场与语义变化,归纳出其整体的叙事结构与倾向性特征。

四、报道样本分析

报道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对相关事件的重视程度,老挝、缅甸、不丹三国并未对事件做出相关报道。从报道数量上看,巴基斯坦三家主流媒体对沙伊复交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印度比巴基斯坦略少一点。相比之下,尼泊尔和越南的报道数量则显得较为不足。巴基斯坦媒体对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事件的报道数量居于前列,超过印度等区域大国,这一现象与中巴之间长期稳定且紧密的双边关系密切相关。中国与巴基斯坦自建交以来即建立了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的推进深化了两国在经济、安全、外交等多方面的合作。由此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外交行为的关注度极高。中印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地理上接壤,且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方面均互有交集。两国的外交关系复杂且具有多维性,既有经济合作,也有边界争端。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印边界争议和战略竞争一直是两国关系中

的重要议题。两国虽在一些领域合作但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上一直存在竞争。对于印度而言,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事件。尼泊尔、越南稍显不足。在事件的初期阶段即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国在北京发布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双边协议时,巴基斯坦、印度与尼泊尔媒体迅速响应,相关报道数量达到顶峰,占据整体报道的75%以上。在事件发生日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度最高。而后事件热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4月的报道数量显著下降,在5月份出现了报道空缺又于6月份略微回升的现象。2023年4月6日,沙特伊朗外长七年来首次正式会晤。2023年6月7日,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两国外交官员的见证下,于当地时间6日正式重开。由于两个后续事件的发生,4月相关报道虽急剧下降但并未出现空缺,在5月份出现了报道空缺,6月份略微回升。

从报道趋势来看,报道整体趋势受事件影响阶段性变化。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变化趋势相似,在事件初期沙伊双方签署《北京协议》时报道数量在本国所有报道数量中占比最高,4月下降,5月出现报道空缺,6月、7月由于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重开报道数量略微回升。越南在3月、4月对相关事件分别有一篇报道,5月及以后没有任何报道。尼泊尔和越南的总报道数量较少,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趋势变化相对平缓,印度的报道数量则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表明印度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较高,但随着事件的进展,报道热度迅速消退。

四国主流媒体报道整体以通讯、消息、深度报道与评论文章四种体裁为主。各国对不同新闻体裁使用占比各不相同,越南、尼泊尔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较为有限仅有通讯、消息,报道风格以传递事件进程为主相对简洁。报道内容多为基本事实的介绍而缺乏深入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更多的分析与评论。评论类报道反映两国媒体对中国斡旋角色的高度关注的同时展现了对中东外交局势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斡旋新闻的担忧。

报道倾向性分析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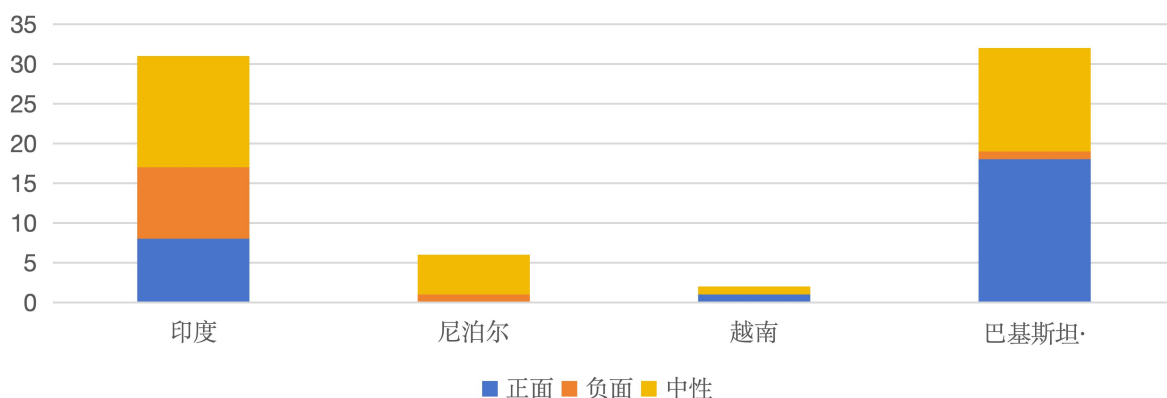


图1 报道倾向性情况

越南的媒体以陈述、分析事件为主,且在报道方面主要阐述沙伊复交,虽然在报道中用到了“斡旋”此类情感倾向偏正面的词汇,但占比极少且仅于交代事件过程中,提及感情色彩的流露不明显。由此越南整体上的情感倾向处于中立。尼泊尔对沙伊复交的相关报道中中立报道占比83.4%,负面占比16.6%,总体呈现中性偏负面的情感倾向,其中中立报道同越南一样以陈述、分析事件为主。而其负面倾向的报道通过列举中国外交中一些如“对西方的愤怒爆发”和“中国在台湾地区事务上的立场引发一定舆论反应。”表达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带有一定消极或批判意味。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中立报道占比最大约为45%这一趋势表明,在涉及沙伊复交的报道中,印度更多报道无明显情感倾向的、更加客观的新闻。这部分报道的主要形式是通讯和消息,内容围绕沙伊复交过程来报道,而不在语言上过度渲染或添加主观感情色彩;负面报道次之,占比约29%,该类报道主要是评论文章,对事件或话题进行观点陈述和分析的报道以表明印度对中国的担忧或警惕;正面报道占比最少约为26%,此类报道主要是通讯,在其中肯定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的积极作用。在对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关于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事件的32篇报道进行情感倾向分析后,结果显示:正面报道占据主导,共计18篇,占总样本的56.25%;中性报道13篇,占40.63%;而带有负面情绪的报道仅有1篇,占比3.13%。巴基斯坦媒体在此议题上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正面态度。在媒体叙述中,中国被频繁塑造为“和平缔造者”与“负责任大国”,其外交努力不仅有助于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也被视为地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带来潜在发展机遇的积极力量。即便是那一篇带有负面倾向的报道,其负面倾向更多集中于大国博弈的现实复杂性和对美国以色列“破坏者”形象的塑造描述,而非直接否定中国的外交斡旋角色。这种高度一致的积极态度反映出中巴之间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体现了巴基斯坦媒体在涉华议题上的认知倾向。

尼泊尔、越南的相关报道更关注沙特伊朗和解过程本身报道相对客观中立,印度自身角度出发对事件进行报道更关注中国对印度利益的影响,正面负面均有涉及。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整体立场明显偏向积极正

面。

五、媒体报道的叙事文本分析

(一) 角色

中国为中东局势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2022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并出席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首次峰会。2023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这是伊朗领导人20年来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在对于中国角色的塑造上,越南媒体整体呈现出中国作为和平的推动者形象。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越南在对相关事件的报道中明确提到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同时直接引用中国外交官王毅的评价“沙伊复交是对话与和平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该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在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并非被简单设定为一个中立协调者,而是在多重话语逻辑中被赋予了积极、主导与结构性等复合型角色。作为“和平调解者”,中国被频繁嵌入以“积极贡献”“外交胜利”“建设性力量”等措辞构建的叙述中,通过积极正面词汇反复强调其在事件推进中的核心作用。这种语义赋权体现出媒体在态度评价维度上对中国行为的高度正面认同。同时,中国被进一步建构为“全球秩序重塑者”。其主流媒体将此次斡旋置于美国全球影响力衰退与多极秩序崛起的宏观图景之中,强化中国在地缘政治重构中的能动性合法性。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制度吸引力与现实利益协调力的多维角色形象,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区域外交中的话语权上升与影响力拓展。

尼泊尔方面展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中国角色。一方面肯定中国的积极斡旋作用,在尼泊尔媒体关于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系列报道中,中国普遍被设定为本次事件的和平调解者。尽管相关报道整体语气保持中立,缺乏明显情绪化修饰,但在具体的事件叙述与背景交代中,用积极正面词汇呈现出对其角色的肯定并未削弱中国的实际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质疑中国推动沙伊复交的动机。如在尼泊尔媒体报道标题中“unfamiliar”(陌生)一词在语义上中立,但结合其隐含着对中国此前缺席全球外交的批评,该词暗示其当前角色的“非传统性”与“过渡性”。同时在报道中将中国与美俄等“老牌全球强权”对比,强化了“新崛起国家”与“既有秩序维持者”之间的隐性权力区隔给中国赋予了逐渐试图插足旧秩序的参与者身份。在分析中美角色替换时,尼泊尔方面有报道将中国调解行为置于中美竞争框架中分析,将中国描绘为“战略挑衅者”;将中国斡旋行为解读为对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有意削弱与挑战,而非出于和平理念的积极外交参与。其报道中通过一系列关联性叙述,将中国调解行为与其全球能源利益绑定。指出中国是中东能源出口的最大客户,且与伊朗之间存在四千亿美元的投资承诺。通过这种叙述方式以表面提供客观事实支持的方式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动因与经济利益深度挂钩从而质疑其外交中立性。尼泊尔方面在情绪色彩的具体用词方面使用使用负面修辞解读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利益引导的调解者”而非“中立调解人”的角色。

尼泊尔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稍显复杂。其媒体在相关报道中确认了中国外交在区域冲突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其报道也通过精细的修辞和结构安排,强化中国“非中立、非道义”的外交印象,构建出一个介于“和平推动者”与“利益引导的调解者”之间的角色。

印度媒体主要从中印战略竞争的视角报道此事件,强调中国的中东行动对印度地区利益和安全的影响。这类报道认为,这种关注源自两国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历史性摩擦。中国在中东和印度洋的外交行动引发了印度对其传统地位和安全利益的深刻担忧。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争议自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便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虽然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有所发展,但边界问题和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依然存在。

印度报道在描述中国外交行为时通过一系列高度价值化的表达手法,对中国进行了负面政治定性。其部分媒体使用负面修辞解读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强化中国在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的压迫性形象。在叙述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将中国设定为一个拒绝妥协、不尊重邻国主权、动辄诉诸武力的“新殖民主义者”。而当中国在中东扮演和平调解者时,媒体使用情绪化词语评价中国外交动向,语义上形成了对中国全球行为“合法性”的系统性削弱。一些评论中使用‘主宰’等词汇来强调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行为特征。

印度媒体报道将中国调解行为置于中美竞争框架中分析,强调中国是潜在的全球秩序构建者与旧有霸权的替代者而非单纯调解者。将中国斡旋行为置于全球权力更替的框架下,表现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提升话语权、参与制定新规则的意图。“Supplant”(取代)内在语义具有极强的替代性与权力位移感,暗示着中国并非在现有框架下协同合作,而是在寻求取而代之。同时印度媒体在报道中通过突出“野心”“挑战”“替代”等词汇,将中国扮演的中立的“和平调解人”角色转变为一个在国际秩序中跃跃欲试的“挑战者”,希望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地位。

中国的调解行为被视为高度策略化、功利的行为。媒体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战略布局”“形象管理”或“现实利益”,其新闻报道中将中国的调解行为视为其扩展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借此挑战美国

在中东的传统主导地位。同时将能源安全看作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依赖中东地区提供大约40%的石油供应,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推动两国和解实质上是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通过斡旋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中国不仅能够促进地区的和平,还能进一步巩固其在中东的经济与能源利益。

总体而言,印度媒体相关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其媒体报道在肯定中国和平的推动者的同时质疑中国调解行为的动机

(二) 布景

越南相关报道数量仅有2篇且篇幅简短,其媒体在事件整体背景的描述上在将沙伊复交事件置于长期教派冲突与地缘竞争的背景中,通过铺陈伊沙关系缓和的时间链条与多轮谈判背景构建出“长期对立、渐进缓和”的历史背景。其报道中提及自2021年起双方即在伊拉克与阿曼斡旋下展开多轮接触但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直到2023年3月中国主持谈判才实现关系正常化。强调当前的外交成果具有“缓和冲突”的转折性意义。报道语境构建出中国作为和平推动者的角色。

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事件时,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嵌套式的布景与语境体系,赋予该事件以深刻的历史连续性和现实战略意义。从历史脉络上看,其媒体回溯了沙伊关系的演变路径,包括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对伊拉克的支持、2016年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后引发的断交风波等节点事件。这些历史材料不仅作为事实性叙述呈现,更在话语层面上构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历史”的宏大背景框架,为当前复交的“意外性”提供了叙事张力。在地缘政治语境方面,媒体将中国斡旋嵌入“美中竞争”“单极秩序终结”与“多极化趋势兴起”的全球权力转型图景之中,明确指出沙伊缓和不仅是区域事件,更是全球战略再配置的一部分。

尼泊尔媒体在背景的描述上更关注沙特与伊朗自身出于地区安全战略考量所作出的调整。通过报道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沙特对导弹袭击的指控、核计划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纠葛,构成了尼泊尔媒体所设定的事件深层冲突脉络。沙伊双方在持续动荡与安全困局的挤压下必须主动寻求缓和路径,以摆脱长期代理战的困局与国际对抗的牵制。两国外交转向被放置于沙伊国家利益重新配置、区域稳定性需求上升的大背景而不再被简单归因于外部斡旋的突破。

印度地区的布景更加宏大但负面,其关注点放眼世界范围内权力的变化而不局限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终落脚印度。印度对语境的关注则重点在自身,因此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事件背景主要在于中国在中东地区行为对印度影响力与地位的影响。印度媒体普遍将此次中沙伊协议放置于世界秩序权力西退东进的背景之中。同时不断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削弱,其盟友之间的裂痕加剧。如沙特对以色列的迟疑、对也门战争的疲惫、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满。中国正是在这种动荡与战略真空之中得以以“和平调解者”的身份破局进入,为中东局势稳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印度媒体广泛运用背景交代与细节补充,借此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构建出一个“深层动因”的战略布景。中国的和平斡旋并非单一目标,而是服务于其更广泛地缘利益与权力布局的工具性手段。有评论指出,随着华盛顿将资源投入乌克兰战争以及与中国战略竞争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中国对中东地区能源需求的稳定依赖和“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新型贸易关系使得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东局势,以满足其石油进口的需求和加深经济联系的动机。^[7]报道更倾向于从“战略审慎”与“防范式观察”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介入中东事务的行为。

(三) 情节与冲突

越南媒体对于中国斡旋沙伊复交事件的报道中情节比较单一。越南媒体主要以旁观者的视角转述沙伊复交这一事件,客观中立梳理了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冲突动荡及中国外交不断探索在调解全球冲突问题中的作用。

在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中,情节没有那么复杂。巴基斯坦媒体梳理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矛盾以及美国霸权对中东地区产生的负面作用,引述专家、官员的评论看法,肯定中国在沙伊复交中所起到的我选调节作用和中国外交不断探索在调解全球冲突问题中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中国斡旋行为成功对巴基斯坦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在冲突的构建中主要聚焦两方面中美和中巴,美国在中东影响力减弱,而中国则通过调解沙伊关系增强了自身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处理方式在冲突结构上形成一种“中美竞争”的设置。

尼泊尔媒体在对“沙伊复交”事件进行报道时,情节相对越南稍显复杂。但依然是以旁观者视角来转述沙伊复交事件,与越南不同的是,尼泊尔媒体在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上肯定了中国“推动”的积极作用,但其报道中部分报道源于美联社,其针对中国的报道倾向显得不是那么正面积积极。其媒体也表达了对中国涉外立场的不一致看法。在冲突的构建上,尼泊尔媒体通过引用美联社文章体现出,中美在中东媒体中还是呈现出“敌对竞争”的状态。

印度媒体在对“沙伊复交”事件进行报道时,情节复杂得多。首先在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上肯定了中国“推动”的

积极作用,但其报道就中国参与“沙伊复交”事件出发有意针对中国参与这一事件的动机进行了分析与猜测。同时就中国的外交、军事行为大做文章。在冲突的构建上,中美在印度媒体中还是呈现出“敌对、竞争”的状态。中国与中东则是由于中国对中东严重的资源依赖和推进“一带一路”的需求,需要从稳定的中东局势中受益。中国与印度则是印度忧虑、警惕中国的军事、外交行为。

六、媒体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越南、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四国主流媒体(2023-2024年)关于沙伊复交事件的71篇报道分析发现,南亚东南亚陆接国家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呈现显著分化:

和平调解者:媒体对中国和平推动者形象的承认表明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是全球安全理念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实践成果,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外交行动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责任感与贡献意愿,展现出中国愿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付出努力、承担使命的姿态。沙伊和解的实现为中东地区带来缓和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替代路径。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推动区域安全提供支持,不仅提升了其在中东的政策信誉,也强化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认知。

战略扩张者:中国在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中的活跃作为,在部分国家媒体报道中也被赋予了战略竞争维度的解读。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并非单纯作为和平推动方出现,更多被视为一个通过参与中东事务来提升地区参与度和话语影响力的行动者。沙伊复交事件在该语境中不再被看作是单一的外交协调成果,而在印度媒体的语境中,沙伊复交事件并非单纯的外交协调成果,而被视为中国推进地区政治影响力、强化能源战略联系、并逐步削弱美西方传统地位的一项战略性介入行动。其外交活动已不仅仅停留在劝和促谈层面,而是服务于长期谋划中的战略利益拓展。

现实主义行动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撑,确保国内经济稳定与社会秩序,是其实现全球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中国对波斯湾地区的依赖随着经济持续扩展、能源消耗显著上升日益加深。数据显示,中国约50.7%的石油进口来自波斯湾国家,这使得中东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布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斡旋,一方面源于其对能源持续供应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密切相关。作为重大战略平台,“一带一路”亟须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作支撑,而中东的安全形势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经贸布局与基础设施合作的可持续性。

七、媒体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在媒体报道中的情感表现,是国家身份、战略关系与信息话语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对外交事件的直接反映。研究发现媒体的情感倾向受到国家与中国之间地缘政治关系与现实利益诉求的影响。与中国战略关系密切、舆论环境稳定的国家通常在报道中呈现出对中国外交行为的积极评价。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国家在报道中表现出较强的警惕与批评态度,印度媒体将中国的外交举措解读为扩大地区影响力或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部分国家信息来源依赖性较强,其主流媒体报道多基于西方通讯社内容编译,话语框架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视角偏移。

中国与巴基斯坦自1951年建交以来始终保持高度稳定的政治关系。20世纪60年代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议,奠定了深厚的政治互信基础。在此后的多边外交与地区事务中,两国在多数议题上立场一致,政治关系不断深化。2005年中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进一步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一步加固了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与安全等领域的战略互依同时增强了巴基斯坦对中国国家角色的正面认知与政策期待。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事件时展现出高度积极的立场,在其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将中国建构为和平缔造者与全球秩序建设者,这种情感倾向不仅体现出对中国外交行为的认同,也反映了中巴特殊政治关系对巴基斯坦涉华报道的深层影响。在国家利益方面巴基斯坦的报道强调中国在地区调解中积极作用的同时将中东局势稳定与巴基斯坦地缘环境改善联系,其媒体认为稳定的地区格局有助于推进中巴经济合作,降低安全风险,增强与伊朗的双边沟通与能源协同。

印度与中国长期存在边界争议和地区影响力竞争,近年来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更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地区战略竞争者甚至潜在威胁。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影响力的增强,被印度部分主流媒体解读为中国“战略扩张”的表现,其调解行为被描述为“抢夺地缘主导权”的手段,媒体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情感倾向表现出明显的防范、警惕甚至批评色彩。尤其是在报道中出现“中国利用外交突破扩大对印度洋的影响”等论述,反映出印度媒体并未聚焦事件本身,而是通过战略博弈视角重构中国的“真实意图”,这一叙述逻辑背后正是基于印度对中国持有的竞争性地缘战略判断。同时印度将自身视为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长期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维持稳定的能源与战略关系。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增强,可能削弱印度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影响其在伊朗、印度洋地区的利益。

其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多将中国调解行为解读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警惕情绪由此生成。

越南和尼泊尔媒体在对沙特与伊朗关系恢复的报道中整体语气保持中性未表现出显著情感立场。其主流媒体报道以事件基本信息和外交进程为主、报道内容侧重于事件呈现，未突出中国在调解过程中的具体角色，缺乏主观评论与立场表达。媒体对该事件的介入意愿有限未对中国角色进行明显正面评价或负面表态。两国媒体的报道风格反映出越南媒体对中东事务的观察态度和在无直接国家利益牵动的背景下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克制立场。

四国媒体在报道沙特与伊朗复交过程中对中国的情感态度差异，深层根源在于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战略友好型国家更倾向于在媒体话语中给予中国正面评价，处于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国家则在报道中显现出更多疑虑甚至批评倾向。国家层面的地缘政治判断影响着媒体在情感层面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国家能否从中国调解沙伊关系中获得利益是影响媒体相关报道情感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相关事件与国家利益构成正向联动时，媒体更倾向于积极评价中国行为；当相关事件被视为区域竞争格局中的变量，媒体则可能表达忧虑或防范立场。国家是否“从中受益”是媒体建构国家形象时情感立场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 [1] 邓纬琳.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内涵、表现与动因[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04):30-54+157-158.
- [2] 牛新春,李绍先.乘势而上: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及其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23,(03):38-54+139-140.
- [3] 李德帅.《中苏文化》关于苏联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1936-1945)[D].河北师范大学,2023.DOI:10.27110/d.cnki.ghsfu.2023.000140.
- [4] Martin I M, Eroglu S. Measur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untry im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3, 28(3): 191-210.
- [5] Baloglu S, McCleary K W. A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4): 868-897.
- [6] 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 3(2):11.DOI:CNKI:SUN:YANJ.0.1996-02-005.
- [7] 周玉.“沙伊复交”报道中的策略性叙事分析[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4.

A Stud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order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Media Coverage on China's Mediation in the Saudi–Iran Reconciliation

Li Boye¹ , Huang Qian²

¹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²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power shifts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digital geopolitics, how the non-Western world decodes China's new practices in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key entry point for breaking the "center-periphery" cognitive paradigm. This study takes the 2023 Saudi–Iran reconciliation as a prism to examine how mainstream media in seve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ordering China (India, Nepal, Vietnam, Myanmar, Laos, Bhutan, and Pakistan) construct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a's mediat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t explores how the region builds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its China-related reporting.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across dimensions including reporting scale, emotional tone, narrative framing, and linguistic strategies, and identifies three main media portrayals of China in the region: "peaceful mediator," "strategic expander," and "realist actor." However, due to the absence of relevant reporting in certain countries, the study cannot fully represent the perceptions of all mainstream media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share land borders with China. This issue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National image; Saudi–Iran reconciliation; Mainstream media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